



青岛市博物馆馆藏《明文倣名葩异卉图卷》。

两才女画作，与故宫有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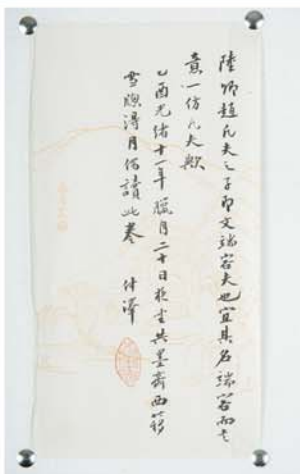
青岛市博物馆收藏两幅书画，一幅曾被乾隆盖印，一幅原件藏于故宫

故宫与青岛

□文/半岛全媒体记者 张文艳 图/青岛市博物馆提供 (资料图除外)

故宫600年，贯穿历史的时空，让文化积淀更加深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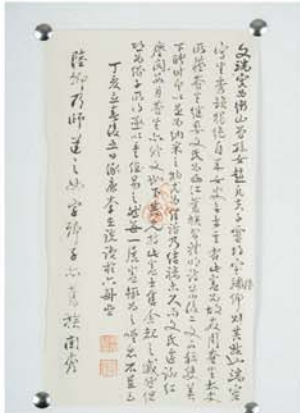
远在青岛，我们找寻与故宫相关的文物，于是，在青岛市博物馆，我们选取了两件宝贝，一件曾经在宫廷停留，被乾隆皇帝收藏鉴赏；一件虽未曾进过故宫，却与故宫中的一件“孪生姐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的主人、它们的经历都值得回味、铭记，本期，我们在故宫外，讲述青岛与故宫的故事。



《明文倣名葩异卉图卷》题跋其一。



青岛市博物馆馆藏文倣花卉图册。



《明文倣名葩异卉图卷》题跋其二。



故宫博物院馆藏文倣花卉图册。(资料图片)

明朝才女

吾山名葩异卉皆南宋诸人描写未到然传形略神古今通弊文倣此卷亦或有神动也，寒山赵陆卿题。铃：“寒山内史”朱文印，“赵氏陆卿”白文印。

一幅典雅清丽的花卉图，让我们走进了一位才女的世界——明文倣名葩异卉图卷（纸本设色，纵29厘米，横862厘米）。

书画世家，文徵明后人

文倣（读 chu，1595~1634年），字端容，吴（今江苏苏州）人，明代画家文从简之女，也是文徵明的玄孙女。她天性聪慧，喜爱绘画，尤其善于画花鸟与草虫。文倣的作品当时在江南一带很受欢迎，有许多女子向她求教。在中国的北京故宫、“台北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以及国外都收藏有她的不少作品。

青岛市博物馆收藏的《明文倣名葩异卉图卷》是她风格鲜明的作品，“图卷用没骨法写异卉七种，并配有怪石小草。构图疏朗浑朴，用笔简逸洒落，意境幽美，设色清新淡雅。湖石用较干的笔墨勾勒而成，笔苍墨健，极富质感。花卉则以没骨法，直接点蘸颜色敷染成花叶，笔致雅淡，色调清丽动人。整幅画面疏密得当，不求甚工，但求灵动之韵。花叶与湖石形成了明显的色调与质感的对比，使整幅作品焕发出强烈的勃勃生机与含蓄隽永之美”。《诉佳人·馆藏明清女性文物展》策展人毛珊珊点评说。

欣赏一幅画作，作品本身是一方面，题跋和铃印也是一幅画的另一个生命。这幅画的落款是“天水赵氏文倣画”铃“文倣之印”（白），“文端容氏”（朱），以上是作者的称号。而接下来的题跋和铃印则向我们介绍了画作的欣赏者和有序传承的过程。

对此，青岛市博物馆馆长赵好进行了

专门的研究，她逐一进行了分析，开头的题跋一署名为“寒山赵陆卿题”，铃：“寒山内史”朱文印，“赵氏陆卿”白文印。这里的“赵氏陆卿”就是文倣的婆婆、赵宦光的夫人陆卿子，著名文学家、书画家陆师道之女。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文化世家，哪怕是在奉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明朝，婆媳二人都能精通诗书翰墨，足见赵、文、陆三大家族的文学修养。“明代是中国女性花鸟画家崛起的时代。据清代汤漱玉《玉台画史》记载，书中一共收集了215位女性画家，其中仅明朝就达102人之多，超过前代数量之总和”。赵好副馆长说，明朝政府实行罚良为娼的制度，使大量良家妇女甚至是上层社会的妇女沦落青楼，其中不乏才华横溢者。“士人们以文采风流，能诗词书画为习尚，以结社携妓郊游为盛事，在这种风气之下，青楼女性云集特别是江南一带，形成了一个有影响力的女性文化群体。除妓女外，不但书香门第、高门大户的妻妾、婢女，就连市民商贾的女子也被要求学习文艺，甚至于朝廷也不止一次地在民间征调才女”。

而她的婆婆陆卿子能够为儿媳题字，并在历史中留下了姓名，也证明她才学匪浅，“陆卿子的书艺、文才比起丈夫来，并不逊色，以著述为例，她也撰有《云卧阁稿》《考筹集》《寒岩誉草》等书”。当然，陆卿子的丈夫赵宦光，即文倣的公公，也非等闲之辈。赵宦光（1559~1625年），字凡夫，一字水臣，号广平，太仓（今江苏太仓）人，国学生，是宋太宗赵灵第八子元俨之后，赵宦光一生未仕，只以高士名冠吴中，身兼文学家、文字学家、书论家于一身。文倣的丈夫赵灵均也是当时有名的文人，他们有着共同的兴趣与爱好。

乾隆盖印，传承有序

“文倣此卷笔致清迥信雅制也，倣为凡夫子妇，此陆卿若凡夫亲属，岂于倣直指其名漫

无称谓，而书则仿凡夫体，俟徐考其人。”这则题跋落款：皇十一子，铃：“听雨屋”朱文方印。

“皇十一子是成亲王永理，与刘墉、翁方纲、铁保并称清四大书画家，藏书亦颇丰，听雨屋是他的藏书楼名。他认为陆卿子题跋的书法风格与赵凡夫相仿，但他不知道陆是赵凡夫的妻子”，赵好副馆长说。

在青岛市博物馆里，传承有序对藏品来说非常重要，文保部主任罗琦告诉半岛全媒体记者，文倣的这件作品就是“传承有序”的代表，所以为“一级文物”。

那么，《明文倣名葩异卉图卷》的传承是怎样的呢？通过它后面的铃印就可以看出来。画心开头铃：“石渠宝笈”朱文，“万寿无疆”朱、白文，“静言息深”“乾隆御览之宝”朱文印；画心尾部铃：“乾隆鉴赏”白文，“三希堂精鉴玺”“宣子孙”白文印。

《石渠宝笈》是清代乾隆、嘉庆年间的大型著录文献，初编成书于乾隆十年（1745年），共编四十四卷，著录了清廷内府所藏历代书画藏品，分书画卷、轴、册九类，是我国书画著录史上集大成者的旷古巨著。不过，“经查《石渠宝笈》并未著录文倣的此件作品，此件作品也许是在进贡官中之后，原计划录入石渠宝笈，但后来有可能又赏赐出去了”，赵好副馆长分析说。

下面重点来了，“乾隆御览之宝”“乾隆鉴赏”“三希堂精鉴玺”“宣子孙”这些铃印很明显出自“涂鸭”高手乾隆皇帝之手了。众所周知，乾隆皇帝很爱在喜欢的书画上题注、评论、盖印，印玺也成为鉴定乾隆皇帝御览、御笔书画真伪和断代的重要依据。乾隆皇帝自诩文采风流，对历朝书画艺术珍品无不广为搜罗、精心收藏，能过他眼的，大多都会在上面“涂鸭”和铃印。元代大画家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子明卷）上，就密密麻麻写满了乾隆皇帝的题跋。“据统计，从乾隆十年到嘉庆四年，画卷上共享55处乾隆的题跋”，

